

长征精神 薪火映淮

杨道文

2026年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

有个问题常被提起:二万五千里长征,路线图上没有淮南。这片淮水边的土地,和那场远征之间,到底有没有关系?

有关系,但不是在地图上。

长征从来不只是一条行军路线。它同时是信仰的传播、骨干的锤炼、火种的传递。淮南不是长征途经的战场,可这条线索,一直牵到淮河边上:寿县小甸集走出去的人走在这条路上;红二十五军在淮河岸上打过一仗;等长征到了陕北,一批从雪山草地上活下来的人又奉命东来,在淮南扎下根,建起了抗日根据地。

一、从寿县走出去的将军,走在长征的队伍里

安徽最早的农村党组织,是寿县小甸集特支。这个地点在瓦埠湖边上,是个不起眼的小镇，早年却出过去一批人。曹广化是其中一个。

他1905年生在小甸集王家岗,幼时在张树侯的私塾读书，受过革命启蒙;1919年转入小甸集小学，这所小学正是小甸集特支的孕育之所。1921年，16岁的曹广化跟着叔父曹渊到芜湖读省立职业中学，在那里接触到陈独秀、恽代英、高语罕、朱蕴山这些人的影响,组织了“爱社”，进行革命宣传活动。1925年5月，黄埔军校招收入伍生,他奔开封报考,被录入第四期。1926年参与组建合肥地区最早的合肥北乡党支部,并在淮河以南组建了安徽最早的农民协会组织。1927年成立中共安徽省临时省委,随后成立寿县临时县委,曹广化任临时县委书记,1931年任寿县县委书记,直至带领游击队员随红二十五军进入大别山区。

据寿县当地的史料记载，曹广化1932年参加红军后，历任师部书记、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部书记、红军总司令部一局二科副科长、科长,管的是机要工作,部队往哪儿走、命令怎么下,都要从他手里过。他跟着部队走完了长征,翻雪山、过草地,到了陕北。长征结束后,他奉命进红军大学学习。后来抗战,解放战争一路南下北上,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,2004年在北京去世，活了整整一百岁。

需要说明一句,曹广化走的是红四

方面军的长征路线，和中央红军那条“二万五千里”不是同一条路线。今天常说“二万五千里长征”，指的是中央红军。红四方面军的路更曲折,来回折返过草地。他吃过的苦,不比那个数字少。

那几年,寿县、凤台一带还有不少青年往鄂豫皖苏区去,加入了红二十五军、红四方面军。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留下名字。

二、红二十五军在淮河岸上那一仗

这里要澄清一个容易搞混的时间。

红二十五军踏上长征，是1934年11月16日,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,全军2980余人,军长程子华,政委吴焕先,副军长徐海东,打着“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”的旗号。他们历时十个月、转战万余里,1935年9月到达陕北延川永坪镇,是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。

而红二十五军攻占寿县正阳关,是1932年5月12日,比长征早了两年半。

那一仗的缘起是情报。1932年春,中共正阳关交通分站站长李乐天得悉,国民党第十一军不日将到正阳关驻防,目的是控制当地大批食盐、西药和粮食。情况报到苏区,苏区决定抢先动手。5月11日,红二十五军出征,12日一举攻占正阳关,临时军部设在正阳北街广嗣宫巷福音堂内。

进城之后,红军贴出《鄂豫皖苏维埃政府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二十五军七十三师联合布告》,当天上午在火神庙开民众大会,宣传政策,控诉土豪劣绅,动员劳苦大众参军。镇里十几家大粮行囤积的百万石粮食分给了饥民,三十多船食盐、西药、布匹、粮食经水路运往苏区。当地百姓很快唱出一首民歌：“四月里来麦子黄,红军来到俺正阳。打一仗来胜一仗,打得白狗子叫亲娘。”

5月14日任务完成,红二十五军返回苏区,正阳关人敲锣打鼓送到城外。

这一仗的意义,得放回当时看。皖北几次暴动相继失败,淮南地区党组织跟鄂豫皖苏区的联系却没断，反倒更紧。红军在淮河岸上打胜仗、分粮食、开大会,就是在那样的白色恐怖里,给淮上百姓看见了另一条路。

但要老实说,这不是长征的序曲。1932年的红二十五军跟1934年出发长征的红二十五军,中间还隔着鄂豫皖第

四次反“围剿”失利、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撤、红二十五军在檀树岗重建、与红二十八军几次合编，建制都换过好几次。把正阳关之战说成长征前奏，是硬往上靠。它真实的身份,是鄂豫皖苏区向外线出击的一次胜仗,是淮南红土地上留下的一处红军印记。

在寿县这片红色的土地上,还有瓦埠暴动、黄家坝暴动等几次失败了的斗争，上面提及的交通站长李乐天,1934年3月在阜阳西城关外牺牲。这些跟长征没有直接关系,但它们共同说明一件事,淮河岸上这块地方,从来不是革命的空白地带。

三、长征走完,人来了淮南

长征最大的功绩之一,是给党和红军保住了骨干。这话不是空话,抗战爆发后，这批人成了各敌后根据地的班底。

罗炳辉就是其中之一。

他是中央红军第九军团团长,全程走完长征,途中善用奇兵、机动开敌,掩护主力突围,毛泽东称他为“牵牛鼻子的能手”。到陕北之后,抗战一起,他奉命东进,到皖东开辟根据地,任新四军第二师师长,在藕塘、半塔集一带带着军民打游击,淮南抗日根据地就是在这期间建起来的全国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之一。

这里有个细节值得琢磨。罗炳辉在长征路上靠什么活下来的?靠的是部队走到哪儿、群众跟到哪儿。他把这套东西原样带到了淮南,减租减息、发展生产、兴办教育、建设民兵,敌后没有后方,全靠江淮百姓撑着。根据地能站住,靠的就是这一条。

新四军二师铁锤子团这样的部队,就是在淮南根据地成长起来的。这支队伍继承的是红军的老传统,打法上延续长征时那种不怕牺牲的劲头。夜袭九龙岗煤矿日军的仗,就是他们打胜的第一场战斗。

长征和淮南根据地,是接续的关系,长征保住了火种,淮南根据地让火种在这片土地上烧起来。

四、这条血脉里的三样东西

把上面这些连起来看,淮南和长征的联系,不只是几个人、几支部队的交集,更是精神上的一脉贯通。

一是绝境里不动摇。长征是在濒临

绝境中坚守信仰、浴火重生。淮南的革命者也走过类似的路,土地革命时期的瓦埠暴动、寿县游击队斗争,一次次失败,一次次重来;抗战时期,淮南根据地在日伪顽夹击下坚持,物资匮乏、强敌环伺,只能自力更生。这种劲头,是长征精神的延续。

二是心里有老百姓。长征能胜利,根子在红军始终依靠人民。淮南根据地走的是同一条路,减租减息、组织群众参军支前,江淮儿女拿出粮食、抬着担架掩护子弟兵。军民之间那份情分,跟长征路上更是一样的。

三是不认输的攻坚劲。长征战胜的是雪山草地和层层封锁。放到今天,淮南面对的资源型城市转型,虽然性质不同,那股劲是相通的，一座靠煤吃饭的城市,要换一种活法。

五、新的一程,路还没走完

90年过去了。对今天的淮南来说,纪念长征不是把历史再讲一遍,而是要弄清,这座城市的下一步,靠什么走。

信念这件事得有人讲。小甸集特支纪念馆、淮南抗日民主纪念馆、新四军纪念馆,都是现成的课堂。曹广化、罗炳辉和淮上那些不知名的烈士,他们的事迹要进校园、进社区,讲给年轻人听。红色资源不能只挂在墙上,得有人讲。

转型这道坎得真迈。当年红军突破层层封锁,如今淮南沿着“拥淮润淮、以煤为媒、向新图兴”的路子前行。引江济淮打通了通江达海的航道，新材料、高端装备制造、文旅产业要一步步培育起来,绿色转型得咬牙往前走。资源型城市转型是一场硬仗,这话不夸张。

老百姓的日子得放在前头。长征的出发点是为人民谋解放,今天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，是让群众过上更好的日子。采煤沉陷区的人居环境要改善,城乡供水、交通这些基础设施要跟上,发展成果最终得落到具体的生活里。

长征这条路,淮南不在上面。

但这条路走出去的人里，有淮南人;这条路走完之后,有一批人来到了淮南;他们身上那股劲,后来在这片土地上扎了根。

九十年了,淮水照旧流。当年从淮河岸上走出去的那些青年,大多没能留下姓名,也没能回来。记住长征,也顺便记住他们,这大概是对那段历史最实在的纪念。

田家庵老北头趣闻轶事

上世纪50年代,国家推行统购统销和凭票定量供应,吃穿日用几乎全凭票证才能购物。那是一个没有票证将“寸步难行”的岁月,田家

庵老北头的人们,与票证有了时代之吻。

1958年全国统一《户口簿》制度正式实施,1955年实行《城市户口粮食供应簿》,这是城里人家最重要的两个证件。《户口簿》证明你是城市户口,上学、参军、工作、办结婚证、生育育女人户……一样也少不了。粮食供应簿是供应粮油的凭证,按每人的工种、年龄、学生上学情况等,核定定量供应。搬运工人、煤矿工人约18公斤,一般居民约14公斤,油每人0.25公斤。粮油定量满足温饱有些差距,往往要购买议价粮补充。

户口簿、粮食簿,是划分城市和农村的屏障,只有城镇非农业户口才有全套生活票证;农村居民一般只分配少量布票、棉票,口粮依靠生产队分配,很少发放粮油票。淮南大建设吸引人到城里工作,农村人因户口、粮食关系而望而却步。当时流传的民谣说:“淮南的工作也好找,就是户口不好搞,户口搞好了,粮食减少了。”

1959年以后,与保障煤矿工人不同,田家庵老北头居民的粮食供应,要搭配30%的山芋干,还配给杂粮面,一直持续到1965年。“你怎么一身的芋头干味!”可不是别人说你“土”,也不是对你随意的调侃,那是你从胃到口腔,到身上的味道,让人闻到特殊时期消化这种食品的嗅觉烙印。

人口出生、婚丧嫁娶,户口和粮油关系都要办理转移手续。有的女孩出嫁了,往往不及时把户口和粮油关系转到婆家,待生了孩子再一起落户婆家,为娘家争取这短暂的“利益”。那时家家户户住房紧张,老小几辈吃住挤在一个屋檐下,这些小事在街坊四邻中不脛而走。“这个媳妇真扒娘家”,周边的门邻感慨着,赞赏还是叹气得由你品味。民以食为天,在这里可以一窥窺豹。

户口簿、粮食簿也是领取各种票证的基础,几乎所有的票证都与粮食簿息息相关,粮食簿副页上往往盖满了各种章戳:“一年一月豆制品票证已发”“一年一月肉票已发”“一年一月布票已发”,与之相对应的是家家户户领取了五花八门的一张张的各种票证。

最重要的票证是粮食簿及粮票,这是吃饭生存最重要的证件,否则在那个经济短缺的境况里难以生存。粮票则是出门在外必带的要件,要吃饭钱和粮票要一起拿出来,缺一不可。

与饮食结合的还有豆制品,这是那个年代每家每户青睐的价廉物美食品,每人每月供应四两。每天早起排队,将豆芽、豆腐、豆干买回来,往往是孩子们的“功课”。

遇到“藏在深闺人未识”的豆腐泡、干张等在菜市场出头露面,如同苦苦旅行的人们,在沙漠里看到了绿洲,这是节日到来的信号,也是知青回城探亲的日子。菜篮子有了多日不见的“面孔”,孩子们就有了久未尝到的美味。

街坊邻居相互打着招呼:“孩子们下放农村难得回城,该买的都买了,保存的豆制品我都用掉了。”

“是啊,是啊,一家老小难得团聚,豆腐就是‘都福’,有钱没钱买块豆腐过节!”

在豆腐的发源地,又处于蛋白质缺乏的年代,那个岁月的豆制品,给田家庵老北头的人们,带来了多少的欢乐与营养啊!

1958年肉食供应紧张,实行凭票供应。田家庵老北头每人每月定量为10克杂肉和10克精肉。到1963年国民经济调整,肉食增加到每人每月25克,逢年过节才增加定量。菜市场的肉铺里,买肉的人挤在一起,眼盯着挂在吊杆上的猪肉,叫嚷着要板油、要肥肉,回家炼成猪油,丰富饭桌上的油水。抢到的满心欢喜,手慢的只能买到瘦肉或骨头,嘴里嘟囔着:“肉票到期了不买要作废,买了瘦肉回家要闹气。”副食品类的鸡蛋票、糖票、烟票、酒票、水产票等,还有日用百货类的肥皂票、火柴票、煤油票、煤票、工业券。每个票证都由家里小心翼翼保管好,随时派上用场,千万不能掉链子。

三十年河东、四十年河西。如今的菜市场里,肥肉无人问津,瘦肉也要翻来覆去。我们这些古稀之人,经历了从吃不饱到吃饱、从吃好吃得营养,真的太感谢党、感谢改革开放了!

“吃”是头等大事,“穿”紧随其后。做衣服、被褥都需要布票、棉花票,城镇居民按每人每年7-15市尺发放布票,每人每年1斤皮棉,做棉被、棉袄、棉裤,必须凭棉絮票购买棉花弹棉,无票不能买散装棉花。三年困难时期(1960-1962年)大幅压缩定量,居民年均仅3~6市尺,一家两三个人全年布票凑一起,才能做几件衣服。棉花从1斤压缩到仅2市两(0.125斤),普通人好多年很难弹一床新棉被,只能旧棉反复翻新使用。

母亲到商场买布,往往要看有没有“布头子”(一卷布买到零头布段)或残次品,这样就可以打个七、八折,将布票用到极致。还有包装布匹的包装布,也可以将就做个村里的衣服。甚至办丧事的白布也留着当口袋布,真是做到了物尽其用。

一家兄弟姊妹“连根长”(出生相近),衣服大的穿过了,小的接过来,这是田家庵老北头儿女们的往常。奶奶的功夫是缝补衣服,针脚细密、补丁周正。让我穿针引线时,她理着满头白发,口中念叨着:“新三年、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。”

到了80年代棉布、棉花已放开供应了,但年轻人结婚,新婚房的床上,往往堆着6-10床棉被。这是娘婆两家将宝贵的票证,为一对新人准备的暖心装备。迎亲的鞭炮一响,街坊邻居涌进新房,首先看床上堆着多少被套,以此作为评价婚事隆重与否的参照。从上世纪50年代的一张床、两条被就进洞房,到80年代按有多少床被,作为婚事丰俭的标准,可见生活有了起色,温暖有了保障。田家庵老北头的一代人,开始向更美好的生活迈进。

随着改革开放后生活条件的改善,结婚流行“三转一响”。“三转”是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,“一响”是收音机。而这些紧俏商品都要票证才能买到,有时是分配到单位,按工龄、评优排队分配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是从“三转一响”开始,虽然初步摆脱贫穷,进入相对宽裕的时代,但票证依然不离不弃,恋恋不舍地环绕你的左右。

1980年代,市场上粮油食品丰富,城里人粮票有了剩余,农民进城需要粮票。粮票规定禁止民间私下买卖、互换,但随着食品丰富,城乡之间很多人用粮票换鸡蛋,人们在票蛋交换里找到了价值,仿佛从厚实帷幕中看到一束微光。粮票(计划分配)和鸡蛋(市场调剂)都是经济调节手段,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方式。只是生产的蛋糕做大了,使得分配的手段多样了。不久废弃了粮票,所有的票证退出了历史舞台。仿佛暖流滋润、冰山融化,万物生长、欣欣向荣,我从老北头的烟火气里,感到社会进步的脚印是那样的扎实和稳健。

七十多年的时代变迁,天空还是日月星辰,河流还是奔腾不息。田家庵老北头的人们,从吃穿用这些最基本的生活日常,送走了票证时代,迎来了盛世年华。那一片片的云影伴随着我们,记录了春夏秋冬的风景,还有难舍难弃的回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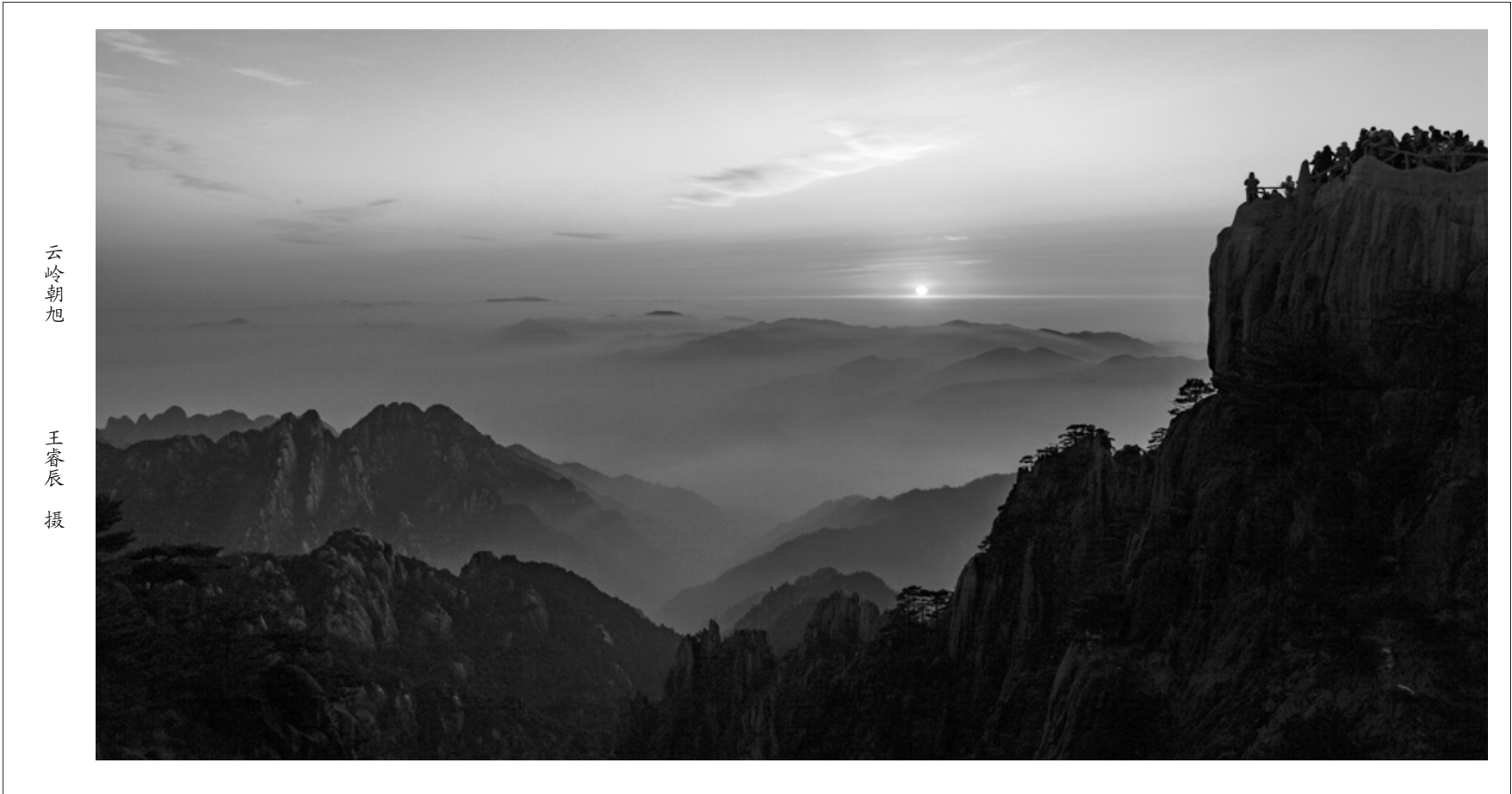


岁月留痕

陆士德 摄

票证年代的那一片彩云

高振中



云岭朝旭

王睿辰 摄

春光映记的照相馆

王晓珂

照相技术自1839年在法国问世,以后在中国逐步传播开来。1909年,上海已有30家照相馆。此时寿县古城的几个年轻人则来到上海,开始学习摄影技艺,为日后回乡开办照相馆打下了基础。

记得小的时候,到古城东街春光照相馆照过学生照,后来到了初中,又去了几次拍照,一般都是用在学生证和准考证上的。而到高中了,与同学一起拍一张合影留念的照片,记忆深刻的是照片右下角有个毛笔书写的标识:春光照相馆,看着很有仪式感,微笑一点……”然后轻轻捏下手中的气囊,一张照片就完成了曝光。但接下来需要冲洗底片,晾干,再用显影和定影药粉洗出照片,有时业务繁忙的时候,取照片至少要等上一个星期后。那时候张厚军已经从老一辈们的手中接下了照相馆的接力棒,而成为

馆里的主人。老一辈的创始人已不在了。张厚军的父亲叫张文忠,解放前15岁去当兵,旧时在蔡锷的部队里,是一位抗战老兵,与日军作战时负伤。退伍后在西安学习照相技术，解放后回到家乡,进入春光照相馆工作。毕振亚是易彦方的女婿,五十年代他与张文忠一起前往六安,历时两年,参与筹建皖西照相馆。

春光照相馆经理张厚军的爱人是易彦芳的孙女。易彦方在一百多年前民国八年(1919年)六月创建了寿县第一家“彦芳照相馆”。开张的地点在钱李巷,当时门庭若市，前往拍照的人们聚集在店里,排队等候,生意特别的好。易彦方出生于1901年,祖籍江西,来到古城寿县与西园王姓女子成婚，少年时在上海学习照相术与镶牙技术,在照相馆的同时,他于1954年加入寿县卫生工作者协会,在城关区照壁巷私营经营镶牙行业。

1919年,古城里的北照壁巷口又开

了第二家照相馆,为北过驿客人吴永庆开设的,照壁巷口是个繁华地段,吴永庆租用的是姐夫黄家两间临街的店面。开始的店名叫“摹真照相馆”。古城里两家照相馆的开张,婚礼、寿诞、孩子满月等到店拍照的人络绎不绝,生意十分兴隆。二年后吴家派儿子去上海王开照相馆学习技术。

随着易家与吴家两家照相馆的名声渐大，于是吴永庆决定给照相馆更名,参照上海滩上生意火红的王开照相馆,于是改名为“吴开照相馆”,以均沾运盛。

继易、吴两家照相馆之后,寿县古城里后来又相继开设了靳家的“中维照相馆”和毕家的“美芳照相馆”。中维的开办人叫靳中维，以名取的照相馆名。而美芳照相馆则是易彦方的大女婿毕中亚开办的,毕家的美芳照相馆设立在木头牌坊巷里。

1956年,开始建立社会主义高级合